

《我向总理说实话》作者 李昌平

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温铁军 特别推荐

章敬平 著

南平寓言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

中国农民问题是个『球』

『三农』药方再审视

南平

章敬平
著

寓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平寓言/章敬平著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
2004. 10

ISBN 7 - 213 - 02922 - 3

I. 南... II. 章... III. ①农业经济—研究—南平市②农村经济—研究—南平市③农民—问题—研究—南平市 IV. ①F327.573②D42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2215 号

南 平 寓 言

章敬平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市场部电话(0571)85061682 85176516
激光照排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淳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(浙江淳安千岛湖镇)
开 本 787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9 万 插 页 2
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 - 213 - 02922 - 3
定 价 25.00 元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2004年5月31日晚,撤出“闽北农村调查”的最后一个驿站,我已知道,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。

我惊讶于环武夷山的闽北农村,被绿水青山遮蔽的贫穷,超出了我的想像。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陈“农民真苦,农村真穷,农业真危险”。过去两年里,李昌平以“向总理说实话”的名义,陈桂棣夫妇以一部《中国农民问题调查》,向天下人道尽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。

2004年一号文件的出台,以及农民政治的种种迹象,无不显示执政者已洞悉农民的苦难。此时,再写一本描摹农村苦难的书,不管煽情得多么成功,于我,于《南风窗》,均属多余。且不论资政价值是否式微,仅就中国农民问题的未来而言,一味地痛陈和惊呼,会不会让公众最终失去解决问题的信心?

众所周知,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新世纪的最大问题,业已在中国权势阶层达成共识。知识分子和具知识分子气质的传媒,当下的视野,当从为农民讨说法,转变到为农民想办法。

书斋中想不出拯农民于苦难的良策。获知闽北致力于农民问题的中观实验,已经悄悄做了五年多,我从心底生发出“看看再说”的冲动,尽管我满腹怀疑。中国是个出经验的国家,从农业学大寨开始,层出不穷的经验并没有让农民最终走出贫穷的境地。

出发前,有人告诉我,源自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两纸批示肯定了南平实验。我未置可否。真正触动我的,是李昌平和董跃玲的首肯。我不认为李昌平的访问,管窥了南平实验的真经,但我相信他作掩饰不住的“吹捧”时,态度是诚实的。董跃玲,《中国青年报》的女记者,我大

学时代的偶像，只身一人翻山越岭的采访方式，赋予她的新闻作品以无限的公信力。从《中国青年报》“冰点”上读到董用“脚”写成的詹夷生，一个南平实验中的典型人物，我决定早点去看看。

“五一”长假前一周，经由地方官员的引领，我走马观花跑了几个山区县。我当然不认为，南平实验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完美无瑕，可我觉察到，南平实验中堪称经验的探索，对中国欠发达地区的乡村，有着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。南平的先锋官们已经和正在作出的努力，或可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趟出一条路。

假期一结束，我再赴南平。这一回，我谢绝了地方官的陪同，邀《闽北日报》的一个记者同行，依自行选择的采访地点和采访对象，一路颠簸到深山老林。没有副秘书长同行的采访，也就没有了前呼后拥，没有了看脸色说话，没有了“汇报”和早已准备好的提纲。以我有限的观察，南平实验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。它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技诸多层面的系统努力，松缓了剑拔弩张的乡村矛盾，剥离了过去数十年来我们对农民欠下的部分“呆坏账”，不仅为几百万农民争取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，也为执政党完成乡村底层社会的结构重建赢得了时间和空间。平心而论，南平实验只是过渡时期的过渡办法，现阶段，它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办法，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最好的办法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办法。中允地说，指望在南平这个中观区域内找到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所有答案，是不现实的。

虽此，我还是对南平实验的决策者、推动者、执行者表达了自己的敬意。尽管我在有节制的写作中，一再提醒自己不能偏离客观公允的第三方立场。实事求是地说，中国三农问题是个体制性、历史性难题，对它的根本解决远远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所能做到的。对于主政一方的官员来说，没有一点唐·吉诃德的精神，断不会迎难而上。何况，1998年至2003年间，三农问题并没有达成今天这样的朝野共识。在世人对于GDP几近崇拜的过去几年，一个地方官员敢于在非议中致力于三农问题的探索，所仰赖的不仅是一种政治智慧，还有勇气，乃至良心。

秉承这样的认知,我决意写一本以南平实验为主题的书。就逻辑而言,在农民问题已经赢得广泛尊重的当下,探讨如何破解农民问题,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我知道,对这个实验的描述,极易被人理解为经验写作,对写作者来说,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。今日中国,揭露黑暗和罪恶,很容易赢得“有良知,有责任感”的美誉;传播经验则不然,由于经不起检验的“经验”泛滥成灾,写经验者,在经验主义者眼中,多是“没有骨气的文人”。

我打算冒险一搏。我要客观记录南平农村见闻,供有志于探索中国农民问题解决之道者,品评借鉴。不止于此,我还要以一己之见,陈述南平经验的全部内涵,思考延展开来的南平寓言。我希望中国农民问题,不再是一只漂浮在水面上的“皮球”。

“皮球论”的版权属于一个南平农民。五年前,中共南平市委前任书记李川,下乡跟那个农民谈心。农民指责官员对待农民问题,就像皮球丢进井里,漂浮着,沉不到水底。这个儿时早起拾粪被狗撵得到处乱跑的农民的儿子,决心让“皮球”完全沉入水底,从下派科技特派员到下派村支书,再到金融助理、流通助理、龙头企业助理,五路特使像皮球底下的五块缀物,硬生生将“皮球”沉到了水底。

为什么我要将南平实验的书名写成“南平寓言”,又为什么要将南平寓言,拉扯到中国农民问题上,并将之比喻成“球”?这当然是因为那个农民的“皮球论”,与我要论述的事物有着皮相上的极大关联。但原委不止于此。

在南平采访期间,我见识了一拨拨的取经团。据称,南平实验中的经验,正在被中国的很多省份所效仿,我的故乡安徽已传出下派三千名村支书的讯息。此情此景,让我振奋,亦令我担忧。在农民政治浮出水面的当下,对南平实验的复制,会否成为一场应时的运动和政治谋略?我以为,如果南平经验真的存在,那么这经验的核心,不只是方法,还有态度,不只是条文式的规则,还有一颗诚实地面对农民的心。如果我们心灵的“皮球”,不能完全下沉到乡村社会的“水底”,任

何经验的创造和效仿,都只是镜花水月的打捞。

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南平实验理解为南平寓言的首要之义,也是我将中国农民问题比喻成一个“球”的秘密所在。我对“球”的理解,既是一种源头的追溯,又是一种方法的描述,也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隐喻。

古代,寓言是臣子们写给皇帝看的。我的“南平寓言”是写给谁看的?

致力于改善乡村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生态的官员们,是我写作时假想着坐在我对面的人。中国的官员有时候很有意思,在制度不太可能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,老将做不好的事情大而无当地归因于体制或者说制度。我想,主张破解中国三农问题应从制度入手,没有什么不妥,但是技术和制度并非二律背反的悖论,再好的制度,也离不开技术上的精进。

技术是由细节叠合而成的。所以我希冀经由人物命运的沉浮、故事情节的冲突,淋漓尽致地将细节呈现无遗,以期效仿者品咂借鉴。我不敢让我笔下的南平实验,流于空洞或者虚假。我不想任意拔高它的探索价值,只是期待自己能够还原南平经验的真实,让学习它的人们觉得可学,让经验的正面被人吸纳,让经验的负面被人避免。

顺便说一句,作为一个记者,我不但希望自己可以详尽地展现细节的力量,还顺带着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,兼具叙述方式上的文本价值。我厌恶过去常见的官方经验的写作,欲图在坚持独立调查独立写作的基础上,有所创新。

知识界居庙堂之高的部分学者专家们,以及从他们那里寻找理论支持的、明知非农化有害而为之的县域经济执行者,也是我贪图的读者对象。中国 77% 的农户的经济生活形态,以小农经济为主。这是中国农村最为普遍的“乡情”,是无法与西方理论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,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。然而,过去的十数年里,居庙堂之高的部分学者专家们,以及明知非农化有害的县域经济执行者,并没有在意我们面对的“乡情”,他们在谋划农民问题时

也没有尊重我们应该尊重的“基础和前提”。

所以,充盈于我们耳目的,总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“消灭农民”,在于土地私有化,在于高新科技农业等等“高瞻远瞩”的激昂的论调。考察南平的现实,从附着在毛泽东画像上的关于过去的留恋,到渗透在村民言行中的朱熹理学的痕迹,无不提醒那些在聚光灯下振振有词的知识精英们,这些源自欧美的理论和言辞,多么像那个听说灾民饥荒遍野就说“给他们肉吃”的糊涂皇帝。

我还希望欲为农民代言的新闻界的同行们,也能看看这本书。我从南平实验的细节中,发现了自己过去对包括三农问题在内的中国问题的判断,多少有些像书生的梦呓。延展开来,如果我们的身体始终游动在京都、沪上等大城市的楼堂馆所,听取知识精英们的高谈阔论,我们同样会成为一只漂荡在水面的“皮球”,我们看到的只能是武夷山的“半张脸”,只是武夷山的鬼斧神工,以及匪夷所思的文化景观。如此,梦呓式的发言,就是把握舆论工具的我们不能避免的遗憾。

南平一月,是我有限的记者生涯中,最为艰苦最为实在的一次采访。近年来,慢慢走向所谓“高端题材”的我,已经习惯了舒适的采访环境。星级宾馆,有品位的茶楼,装饰考究的会议室,匹配小资生活的酒吧,已定格成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。刺鼻的猪粪,衣衫不整的农民,破败的小学校舍旁光脚的学童,一个上午跑不到一公里半的乡村小路,只剩下老人、妇女和孩子的村庄——南平情状,唤醒了我曾经是一个农民的所有记忆。

所以,我还希望我的父亲母亲也能成为我的读者,尽管我知道合起来只受过不足半年教育的他们,并不能晓畅地通读。

走出乡村整整十年,我考取了博士研究生,组织了有两个博士研究生的家庭。可是,除了将原先在我名义下的责任田,分摊给乡邻,让盼我考取大学的远房族叔们,增添一丁点抛荒的土地,多缴纳几许三提五统,我对安徽长江岸边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,又有什么贡献?或缘于此,我对南平实验中那些返回故乡当村支书的公务员们,钦佩不

已。他们以三年的筚路蓝缕，换来了故乡容颜的改变。

十年前，我去芜湖读大学，载我报到的船只停泊在长江轮船码头，我想起了我的父亲。我孩提时代的学费和书本，是父亲在泊于码头的沙船上做挑夫换来的。含辛茹苦的父亲母亲，把我送上了大学，却未从上了大学的儿子身上，赢得多少名分之外的福分。

父母亲辛劳大半生，在可以预见的小半生，还将继续辛劳下去。他们和我在闽北看到的农民一样，从未想到他们的艰难困顿，和政策有着什么样的关联，亦无从知晓所谓的剪刀差、城乡二元，对他们意味着什么。

掺杂着复杂的感情，我希望自己能真实地再现南平实验的点点滴滴。无论是好的，还是不好的。我盼望，我能为农民做一件有益的事。一定程度上，本书是我对农民出身的自我救赎。一个朋友建议我在扉页上题写“献给天下8亿农民”，我没有那么大的口气。我只想把它送给我的父亲母亲。

我在闽北的采访几乎没有任何休息的罅隙，晚上的访谈常常拖延到子夜时分。采访本积累了整整六本，数十万字的采访笔记，数百万字的文字材料，是我历次采访中“沉”得最深的一次。别人给我戴了诸如敬业之类的多顶高帽子，事实上，我在本质上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，我之所以会沉下去，是因为我在潜意识中，将这次采访视作我对父亲母亲的一次报答。我祈望能在求解中国农民问题的道路上，为我父母那样的农民最终走出束缚他们的制度困境，做一点有益的事情。

哪怕只有一点点。

前言 “皮球”是怎么沉下水的

美国白宫记者西奥多·怀特，在《美国的自我探索》的开场白中说，不管讲什么故事，都有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：从哪里开始？

对我来说，这一切尤其重要。一个局部地区在中观层面的探索与实验，不像一个悬念丛生的微观故事那么跌宕起伏。基于方便读者阅读，乃至挑逗读者阅读趣味的考量，我先对南平实验五年间的前世今生，作个大历史的观照，以便读者提纲挈领，不致散失在各个章节的阅读中，见树不见林。

2004年6月14日，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梁绮萍等福建政要的坐骑，在福建大会堂门口相继刹车。一地方资深媒体人士称，早在一个月前，中共在福建各县区的主官们，就开始等待是次会议的召开。

与会者知晓，政要们在意的问题，不是军事，而是农民。一位闻听是次会议的北京学者打趣说，中国农民问题对执政党而言，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。

过去五年间，闽北农村发生了一场由中共南平市委主导的静悄悄的革命，它在政经层面的影响力，已锁定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眼球。有人从温家宝总理曾经的批示中，看到过“方向正确”的字眼。主事者认为，是次会议就是对高层政要“希望继续探索和总结”的一个回应。

消息来源说，福建政界对是次会议的期许，是科学地总结以南平机制为核心的农村工作机制，使其以星火燎原之势，漫卷福建经济版图上的贫瘠乡村。

贫瘠乡村之一的南平市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的农民，虽然听不懂是次会议的官方表述，但从电视上浓墨重彩的会议报导中，他们依稀

感觉到福建领导层对农民问题的关注。

他们当中鲜有人知道，他们生活的村庄，就是官方新闻屡屡提及的“南平机制”的发源地。他们更不晓得，南平实验迄今五年的前世今生，是一个乡邻的“皮球理论”擦亮的火花。

一个农民的“皮球论”

1997年底，时任南平市市长的李川，依照市委的既定安排，去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蹲点。在一个年久失修的村部，李和一千随行人员住了五天。

李异常珍惜驻村的机会。他是一个农民子弟，小时候起早拾粪被狗撵得四处乱跑的经历，让他过早地知道，农民的生活绝不像城里诗人想像的那样怡然自得。然而，别离乡村毕竟数十年，农民的新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他并不很清楚。过去十数年，出身军旅的他一直辗转于省直机关。1997年5月，李由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，迁任南平代市长。

南平是福建北部的一个农业大市，一块插根扁担都能发芽的沃土。计划经济时代，是福建5000万民众的粮仓。据称，彼时的南平主官去省里开会，会务人员总要在前排给他们预留一个座位。没有哪个文件规定他们在行政序列的排名，应该在厦门龙岩诸市前面。在那个并不时兴GDP的年代，位列三甲的经济指标，给了他们约定俗成的权威。那个时候，就连南平农民，也被福建南部沿海地区的人们所艳羡。南平的一位官员不无怅然地说，曾经厦门人会以有个南平亲戚而自豪，因为他们可以吃到别人吃不到的新鲜大米。

河东河西的变化，大略也就是三十年的光景。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后，风起云涌的市场风潮，迫使南平主官们不情愿地把自己的座位，一步步让给了厦门福州漳州，那些往昔的小兄弟们。风光不再的老大哥，偶尔只能阿Q似地回想一下祖上曾经姓赵的光荣。

出任南平主官，李川不敢凭借出身说自己了解农民，更不敢断言自己了解南平的农民和农村。调研，是他到南平后的日常功课。

李的一个旧日秘书说，是次驻村，对他殊为重要。因为，闽北尚未从一场“经济大地震”中苏醒过来。

所谓“经济大地震”，指称的是 300 余万南平人在是年夏天遭遇的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。南平，这个没落的贵族，再一次受到重创。滔天洪水漫卷而过，一片凋敝的景象，叫人欲哭无泪。

当年的《闽北日报》是这样描述洪灾的：6 月中下旬，特大暴雨在闽北境内瓢泼般肆虐了 12 天，日夜不曾间断，持续时间之长，影响范围之广，带来的危害之重，均为历史所罕见。一个接一个的村庄被破坏，整片整片的农田被冲毁，数十万间民房顷刻间轰然倒塌，数十万灾民骤然间无家可归，有家难回。

洪水过后的统计报表，让履新不久的市长李川头皮发麻：124 人死亡，37 人失踪，560 人受伤；10 个县百分百受灾，178 个村庄荡然无存，223 个村庄失去了半壁江山；倒塌民房 50.5 万间，损坏 82.3 万间，水电路讯全毁，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，工业几乎瘫痪。工业、农业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社会事务诸多层面的创伤，一时难以修复，一些方面的恢复甚至需要几年的时间。

当时的福建农村，“小康运动”颇为流行，但是中共南平市委根本无力去畅想两百余万农民，在朝夕间过上《诗经》描绘过的小康生活。迫在眉睫的问题是：如何引领南平渡过难关？如何让 231 万灾民重建家园？怎样让尖锐的农村矛盾趋于平缓？

怎么办？

靠市府？撤地建市后的南平市，财政收入一落千丈。

靠县区？南平市十个县区，除了市府所在的延平区，都是穷家底，政和、松溪、光泽三县还是国家级的贫困县。过去，他们的手心一直向上，靠“施舍”过日子；现在，水去山河破，那副嗷嗷待哺的样子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靠乡镇？南平全市 142 个乡镇，平均负债 390 万元，以这样的负资产去重建家园，连银行都不敢理会他们。

靠行政村？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。“三个党员八颗牙，还有两颗是假牙。”部分南平官员不敢奢望，仰仗现有的基层领导力量走出灾难后的困境。再说，全市 1039 个行政村，平均债务 39 万元，即便有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底，又有什么力量在废墟上创造奇迹？

靠外援？一方有难，八方援助。南平洪灾后，共收到数百万元的捐赠。相对于 74.9 亿元的直接损失、无法估量的间接损失、百废待兴的颓废之势，外援的财物无异于杯水车薪。

唯有自救！中共南平市委决定把脚伸进农村，学习毛泽东当年的做法，也搞一个南平农村调查，市直官员下农村蹲点，问计于农民，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生活。

李川觉得市委的这个决策不错。他告诉身边的人，我们要把浮在机关的身子，沉下去，不但要深入农村，还要深入到农民的内心世界，看看他们究竟在想什么，他们到底需要什么。

镇官们开始认真地网罗农民和市长座谈。李事先打过招呼，不要说大话，拉家常则可。可是，招呼不太起作用，组织过来的农民，除了腼腆的表情是农民版本，话语体系大多是官僚机构的翻版。

大约是第三天，李川随意溜达进一个农民的院落，一个中年男性农民被动地和他拉起了家常。李说他已记不清那个农民的长相，他唯一记得的，就是那个农民的“皮球论”。

不知道他是市长的农民说：“你们干部下乡，我看像我家用那个破篮球提水，你们从上面看，皮球下了水，我们从下面看，照样漂浮在面上。你们从来就没有下过水，哪里知道我们的深浅，我们的难处？你们不知道我们的难处，还天天说为我们服务。我不晓得，你们是怎么服务的。”

五年过去了，李川特别想找到这个农民，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。

2004年初夏,我赶到溪后村,村支书们都知道这个“皮球”的故事。我想请他们帮助我找到那个农民,大家都摇头,李自己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,那个农民也不晓得聆听“皮球论”的官员,就是当时的市长。由于村里的中年农民有不少都外出打工了,难以一个个调查,我只好作罢。

当下,“皮球论”已被李川传播到整个福建,省里的高官们,也在不同的场合重复这个农民的理论,敦促官员们沉到农村,不能像宫廷御医那样,总是悬丝把脉。

科技特使：第一只“皮球”

震撼于“皮球论”的李川,晚上召集驻村小组开会,似乎有些兴奋,又有些遗憾,他将“皮球论”说与随行人员听。现《福建通讯》常务副主编王志当时是李川的秘书,他回忆说,“皮球论”让大家为之一惊,这个朴实的农民真的是一语中的。

决意不做“皮球”的随行人员,跟着李川四处找农民聊天,观察并发现他们的困难。

三天后的一个清早,李川随一个有点文化的农民,看了一片橘树林。深秋时节的早晨,微风过后,流动的空气沁人心脾,原本有着诗人气质的李,差点为“橘子红了”而失语。领他上山的农民,并不明白市长为什么高兴起来。他有些沮丧地告诉李,他的橘子不甜,没人买,自己都懒得卖。

“什么原因?”李问。

“哪晓得?”农民摊摊手。

“你学过技术吗?”兼任科技局长的李,下意识地想到农业技术。

“看过书。”农民有些委屈地说:“我都是照书上做的,还是又酸又涩。”

“你看的是什么书?”农民支吾了片刻,稍后,他回家翻出一本毛边

四卷的旧书：《柑橘栽培技术指导》。再看编写者：吉林省科委。

同行的一个小公务员急了：“老乡，东北的气候和我们差异这么大，你哪能用他们的书，指导自己种橘子？！”

那个农民一时瞠目结舌，一副恍然大悟、而后手足无措的模样。

李川很奇怪：“你连死书都愿意看，怎么不问‘活书’农技员？”

农民觉得眼前这位市长真是奇怪：“农技员在哪里？我没见过！”

中午，市长问镇长，你们镇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呢？你们的农技员平时不指导农民吗？镇长赶紧解释。在机关工作多年的市长这才醒悟过来，虽然每个乡镇都有七所八站，农技站其实并不为农民干活。王台镇的农技站长，就是溪后村的挂点干部，依理农民应该很容易见到他。

农民们表示，确实，见到这位站长也不难，可是，见到他的时候，都不太愉快。作为挂点干部，他的要务是“要钱要命”。

几经周折，李才明白，所谓“要钱”，说的是收公粮；所谓“要命”，指的是搞计划生育，劝妇女结扎。两件最不讨人喜欢的事，搁在农技站长身上，农民们几乎忘了他的真正身份。

长期在基层行走的随同人员告诉李川，王台的现象，不是个别，整个延平区，或者说整个南平市，6000余名农技人员，没有几个人真的跟农技打交道。人们还告诉他，非独南平，全中国也大抵如此。要不，中南海的那位高级官员为什么得出“网破，线断，人散”的结论？

事实上，李对农村的科技情状，是有心理准备的。他之所以兼任南平市的科技局长，就是想提升农村落后的科技水准。显然，南平农村科技的缺位，比他想像的要严重。驻村小组当晚的总结会上，与会者概括了农技人员和农民的关系：两个循环体，各有各的一套。农技人员写论文写书，评职称，有了高级职称，就为人师表，带徒弟教学生，学生再写论文，评职称，如是往复，就是跟农民没关系。

推延开来，政府涉农部门和农民之间的关系，何尝不是“各干各的”？

有人说，瞧，这就是一只浮在水面的“皮球”。

“必须叫‘皮球’沉下水。”李川问大家，“用什么办法可以让科技人员下乡，直接为农民服务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间或有小声嘀咕，就是嗓门不够响亮。

李川说话了：“选派科技人员下乡去。”

五年过去了，提起往日，李川觉得似乎有些草率，“那时的心情特别急迫，就是希望农业科技人员这只皮球能够沉到水底”。

市长，同时又兼任着科技局长，他的决定在驻村小组会议上，没有遭遇任何异议。

照中共惯例，大凡举动，总要有个旗号。文件在李川返回后第一周打出旗号：“选派科技人员下村开展科技活动”。略有诗人气质的李川，给首批 252 名科技干部，起了一个诗意的称谓：“科特派”，全称“科技特派员”。

尽管中共历史上的“特派员”无上光荣，“科特派”帽子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戴。市府红头文件的下发，一如掠过一潭死水的微风，兴不起一丝波澜。

首先是相关部门有抵触情绪。临时机构“科特派办公室”收到的一份报名表上，写着一把手局长和司机的名字。

基层乡镇亦有异议。他们担心里面下派干部，要吃，要住，要花钱。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在电话中为难了半天，突然话锋一转，跟科特派办公室说：“来吧，来吧，帮我们从上面争取个把项目，来不来上班都无所谓。”

科技人员本身对此项使命，也不太在意。日后成长为“科特派”中明星级人物的方金妹，乍听之下的反应，是“还不和技术下乡一样，搞个走过场”。

消极因素一一反馈到市府。李川在运用行政力量“强迫”推行的同时，有针对性地给出两项“怀柔”政策：

“科特派”带给乡镇的只能是“零负担”，出差等费用均由市府专项

资金给予报销；

“科特派”下乡后，先前的待遇、工资、职务、职称四不变，唯一可变的，是优先晋级提拔。

1999年2月26日，南平市的“天安门”前，252名来自市县乡三级的“科特派”，佩带醒目的大红花，听候市府官员作出征前的总动员。李川反复申述一个要点：你们和过去的工作队不一样，你们唯一的使命，就是科技服务。

似乎厌倦了下派官员的农民，满腹狐疑地接受了他们。浦城一个农民说：“早晨一根竹竿赶出一百来只鸭，晚上一只没回来，科技特派员来了，能让我的鸭子活一半？”

显然，技术在身的“科特派”拯救的鸭子远远不止一半。“没有什么疑难杂症。只是农民们太缺乏科学常识。”南平市科技局副局长张泽华感慨：“科特派早春下乡，夏天还没到，我们就听到底下传来一片叫好声。”

是年秋，张泽华去政和调研，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“股份制”。南平市农校的一个“科特派”，见农民不敢跟他学种蘑菇，就自己出钱买原材料，和农民一起入股。这个利益共同体待一季蘑菇长成后，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。

张发现，这样的事情不止一起。可“科特派”们说起这事，无一例外地遮遮掩掩。张明白，他们拿着工资，又和农民一起受益，心里不踏实。

李川听了张的汇报，异常兴奋，大呼：“方向，方向。”

几日后，张泽华突然发现李川出现在南平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，并再次听到“利益共同体是个方向”的领导意图。

农历新年将至。首批出征的“科特派”，行将服完一年“农技役”，由乡返城。市府尚未作出第二步决策，就陆续收到松溪等县一拨拨农民写来的信，恳请“科特派”再留一年。另有几个“科特派”希望下乡调研的张泽华，转告市委领导，让他们继续把利益共同体做大。